

底层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反思

——以E社工站为例

万江红 黄晓霞

摘要: E社工站自运营至今,在提升农村留守儿童能力与改善亲子关系等方面已初见成效,但还存在实践困境:服务对象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存在厌倦、散漫、抵触等消极情绪,且评估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本文尝试借助底层视角“还原历史”的叙事方法、注重解读“隐藏的文本”以及由微观个体切入宏观结构的理念来解释该现象,希望为解决类似困境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底层视角 农村社会工作 实践困境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14)01-0068-06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4.01.010

万江红,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黄晓霞,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0)。

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产物,国内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发展经历了从知识分子的尝试到发展停滞再到多力推动的恢复发展等阶段(杨发祥、闵慧,2011)。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呈现出两种状态:一种是宏观层面的路径探索,就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专业化、科学化发展方向展开探讨。就理论视角选择而言,在克服传统“问题为本”的扶贫视角带来的弊端基础之上(张和清等,2008),存在增权理论和优势视角的应用偏好,因为农村居民整体处于“能力和资源缺乏”的状态(聂玉梅、顾东辉,2011)。就实践方向选择而言,以强调注重本土文化因素为主,如学者王思斌(2001)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需要以中国本土的文化与现有的经济制度为参考,在此基础上采取依靠原有体系、注重生活文化的策略。学者古学斌(2007)也同样考虑到了文化因素对于社会工作实践的影响,他认为农村社会工作者需要注重自身的主体位置,不能忽视实践中出现的文化识盲现象;另一种是微观层面的实务实践,多以项目运作为主,探讨社会工作在相关领域的介入方式,推进实务技巧的发展,如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与农村留守老人的休闲生活等方面的介入。综合来看,无论是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方向与视角选取,还是具体实务技巧的

研究,都在逐步发展完善,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就其理论视角选择而言,除了增权理论、优势视角和社会生态系统视角,是否还存在能够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其他理论视角?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到底存在怎样的困境?对于这些困境又该作何解释?为解答这一系列问题,本文将以笔者在E社工站的实践经历为例,尝试将底层视角应用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之中。

一、底层视角与农村社会工作

底层研究最早出现于1970年代末的印度,在当地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的推进下于社会学话语空间中迅速扩散。究其原因是底层视角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将公众视线实行了自上而下的转移,突出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强调站在底层群体的立场上,以逐层拆解精英主义历史叙事、重读历史的方法来重新解读底层群体的行动逻辑,还原被遮蔽的底层历史,是一种反对精英霸权主义的研究视角。中国当下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政治化的话语往往掩盖了复杂生猛的社会现实(赵树凯,2008),中国底层群体话语通道的缺失和印度历史中底层记述的缺席是相似的(王庆明,2011)。作为被排除在城市群体等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农村留守群体缺乏社会资源、缺乏畅通的发声渠道,具有典型的底层群体的特质。而农村社会工作的任务便是关注农村底层群体,解决底层群体的现实困难。

底层研究认为现存的对底层的解读的方法都是建构在精英统治者话语框架之内的。为了还原事件本身,也为了表达底层的真实声音,底层研究所采用的是重读历史的叙事方法,一种对文本进行批判分析的解构精英主义的方法,一种以研究对象为主的口述方法。研究者古哈将历史叙事的话语划分为主话语、次话语和亚次级话语:主话语是指官方对底层行动的理解,次话语则是以官方版本的调查报告、回忆录等,而亚次级话语则是指没有被精英话语所遮蔽的原生态历史研究资料(Guha,1983)。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由于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要么缺乏表达的意识,要么就是话语权被剥夺。为了还原服务对象的真实声音,农村社会工作的评估阶段需要借鉴底层视角的方法论,采用多元化的调查方式,融入研究对象群体内部收集亚级次话语。

底层视角强调底层的自主性,反对底层无意识的认识,认为底层是存在自主意识的。虽然底层难以在精英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话语权的缺失导致草根声音模糊,但是其意识表达是以“隐藏的文本”呈现的。在无法应用“公开的文本”发声时,底层们用“弱者的武器”,以偷懒、懈怠等避免正面冲突的方式对抗权威。而底层意识产生的基础便是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经由社会关系网络以一种不言自明的方式产生集体意识。该视角对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启示在于:尊重服务对象,相信服务对象的自主意识,注意倾听服务对象隐藏的声音,重视发掘研究对象潜在真实利益诉求,注重对“隐藏文本”的解读,不能忽视社会关系等资本对服务对象的影响,在某种层面上来说,底层视角的研究取向与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是不谋而合的。

二、实践困境

E社工站位于农村地区,为高校与当地政府合作共建。基于当地留守群体较多的现实,社工站

以村内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群体为服务对象,以服务社区居民、提升服务对象生活质量、增强居民能力建设为目标,希望通过具体实践探索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模式。站内设有四点半课堂、青少年活动室、图书室、老年人活动中心以及残疾人康复室等。工作日开展以学业辅导为主的四点半课堂,周末开展留守老人、妇女以及儿童等系列小组活动,定期举办社区讲座、咨询等社区活动以及入户探访等个案。除此之外,还积极发挥高校优势,链接外界资源,为当地留守儿童筹建图书室,为当地农民举办法律咨询讲座以及茶叶种植技术交流会等。

社工站自创办至今的一年时间内,在提升留守儿童能力以及促进亲子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地政府也逐渐认同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和谐、创建幸福农村”所发挥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社会工作的扎根。然而,新兴事物的推广发展总是困难与成就并行,在取得成就的同时社会工作实践也存在一定的困境,服务对象在活动中的表现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 厌倦情绪

截止目前,社工站开展的活动以留守儿童为对象的居多,主要是基于留守儿童容易接触、能够打开社会工作进入当地的通道考虑。工作初期,社工站每天大约接待三十人左右的来访者,且来访量有逐渐增长的趋势。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关系融洽,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合作,活动氛围较好。良好的局面大约持续了四个月之久,服务对象开始出现厌倦情绪,每天来社工站的人数明显减少,偶尔还会出现无人问津的情况。且来社工站参加活动的留守儿童,对社工站以及社会工作者也存在一定的厌倦情绪。

L是当地的一名留守儿童,家住在社工站附近,其父母离异,目前跟随母亲生活,母亲在当地打零工,很少有时间陪伴L。在社工站刚成立之际,L每天准时来社工站参加四点半课堂,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过来,见到社会工作者的第一句话总会积极地问今天是什么活动,然后便去帮忙收拾场地,有时候还会去叫其他的同学过来参加活动。活动过程中L表现也很积极,主动发言,遇到不遵守规则的组员,他还会及时予以制止。后来,L来社工站的次数逐渐减少,有时候来社工站内走一圈看一看,一言不发地就走了。有时候社会工作者请他去叫同学来社工站参加活动,他会说:“帮你叫了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如果我帮你叫了,你就带我们玩‘杀人’游戏,要不我就不叫”。有一次开展一个情绪管理小组的活动,社会工作者邀请组员共同制定小组规范,L带头起哄,说“又制定规范,都写过几百遍了,烦不烦人啊”,然后顺手指着墙上张贴的规则对组员们说“那,墙上有直接写好了的,直接抄”。为了了解他现在为什么这样表现时,他的回答是“天天搞这个,没意思,还不如我跟同学一起打游戏机”。

(二) 表现散漫

在社工站成立之初,服务对象在活动中积极与社会工作者合作,主动参与到小组之中,配合小组领导者完成小组活动,彼此关系融洽,小组氛围较好。但是随着双方关系进一步熟悉,服务对象在小组中开始表现散漫,不能较好地遵守小组规范,无法按时参加小组活动。在开展小组活动的过程中,小组成员与小组领导者之间互动情况较差,通常呈现出单向交流的状态,即小组领导者发出信息,小组成员对此回馈较少,领导者无法获知小组成员是否已经接收到信息。而对于分享或集体参与等环节要求,小组成员要么低头沉默不语,要么三三两两私下交头接耳。在开展青少年

小组活动时更有在室内打打闹闹、你追我赶的现象。小组的封闭性较弱,小组契约约束力较弱,小组活动过程中常有组员随时离开小组的情况发生,在未交待离开原因、也未征得组员和小组领导者同意的情况下,小组成员随意离开小组后又随意加入。

在一次“爱自己 爱家人 爱生活”的老年人小组活动中,工作人员在活动前期进行了宣传,与愿意参加小组的老人约定好了活动时间,结果到了约定的十点钟,社工站内还未出现一人。社会工作者H见此情形,便带领部分工作人员前往服务对象家中邀请,其余工作人员留在社工站内等候。大约到了十一点,社工站的老人们才逐渐多起来。在活动中,小组领导者邀请大家分享生活小窍门,起初大家都显得很沉默,小组成员C奶奶与邻座W奶奶在相互讨论自己的家事,W爷爷只顾着照看自己两岁左右的孙子。在活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W爷爷的小孙子哭着要出去玩,于是W爷爷便带着孙子离开了小组,半个小时之后,W爷爷独自一人回到了小组。

(三)抵触对立心理

作为服务对象的支持源,社会工作者扮演着沟通者、支持者与指导者的多重角色,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基于尊重与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一种和谐、互惠的双向互动关系。良好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保证,能够提升社会工作的服务实效。尤其是在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农村社区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互动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实践发现,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尚未形成,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度低、存在一定的抵触甚至对立情绪,对于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接纳和认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H社会工作者是该社工站的一名实习生,在实习两个多月的时间里,H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在一次社区宣传中,H和同事们一道走进村民家中宣传关于过春节的安全知识,刚走到一户人家门口,H还没来得及说话,便被户主给拒绝了“你们又不能帮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发这些单子又有什么用呢?温饱问题都还没解决,哪里还想着过节啊”。户主说完便转身走进了屋里,留下H和同事们无奈地站在门口。还有一次,留守儿童Z爬上社工站内的桌子上玩起来,H发现之后立即制止,Z仍然坐在桌子上继续他的游戏,H继续劝说,顺势准备把Z拉下来,Z迅速跳下桌子,打了H一下便马上跑走了,走之前还给了H一个白眼。社会工作者H对此深感无奈“哎,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不是一两次了,更不是一两个。你说这些孩子吧,真的很顽皮,遇到不听话的,你还吼不得也打不得。你笑着跟他讲道理吧,他说你啰嗦,有时候烦了还会吼我们”。

(四)评价的矛盾性

理性而真实的沟通是社会工作介入良好成效的保障,贯穿于社会工作实践的全过程。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对话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服务对象在沟通过程中给予碎片化反馈、采取顺从之下的非真实表达。在效果评估阶段,小组成员被邀请填写活动反馈表,他们的评价往往呈现正向一体化状态,对于活动给予高度评价。而就其日常表现和反馈来看,他们对于活动的认可度并不高,甚至还会有负面的评价。

在一次开展亲子活动的评估阶段,社会工作者邀请组员填写活动评估表,组员H刚开始

有些不太愿意,在社会工作者的劝说下H答应了。该评估表是打分赋值型的,每道题由5分到1分代表满意程度依次降低,H反馈的评估表中,除了一道题选择了4分,其他题目全部选择5分,也就是说她对于本次活动的评价特别高。而在随即的聊天中,社会工作者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H:刚才那个表怎么填的?

X(参与活动的另一个小组成员):随便乱勾的啊。

H:我也是的,我都按照最好的选的,那样他们就不会再找我填了,那个小组根本没意思。

X:就是嘛,每次都要填表,都填的烦了。

而在随后的访谈中,小组成员Y表示:“这样的活动很好,能够拉近我和我女儿的距离,还能让我们能够彼此更了解,刚才的猜兴趣爱好环节,就我们猜对的次数最多,要是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记得叫我们。”然而在后一期的活动宣传阶段,Y便不愿意再来参加社工站的活动,问其原因,她表示这类活动现在已经没有吸引力,参加活动比较浪费时间。

三、基于底层视角下的实践困境原因探讨

(一)亚级次话语的忽视

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实践,评估是贯穿整个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活动开始之前的需求评估、活动之中的过程评估以及活动结束后之后的效果评估等,这是活动顺利开展的保障,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而实践中的评估是以文献法和问卷法为主,这虽然能给调查指引方向与参考,但以他人转述的资料作为基础,或多或少存在“被表述”的意味。同服务对象直接对话的缺乏,亚级次话语的忽视导致评估效果大打折扣。E社工站四点半课堂的成立就是在类似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同当地政府沟通之后了解到当地的留守儿童比较多,家长无暇也无力辅导学业,需要社工站成立四点半课堂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信息来自于主话语和次话语,缺乏与留守儿童的直接对话。在评估过程中,缺乏对各方信息的有效整合,过于注重对文献资料以及他人转述等主话语的发掘和分析,而忽略了对亚级次话语的深入剖析。若能在评估过程中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当地发掘信息,找寻服务对象的亚级次话语,还原一个真实的需求,那么E社工站所开展的活动针对性会更强,对当地村民的吸引力也会更强。

(二)隐藏的文本的误解

留守儿童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积极参与之下,对社会工作者展示的拒绝和对立,实质就是“公开文本”之下的“隐藏文本”的表达。隐藏的文本作为一种没有实体的存在,往往容易被忽视和误解。实践中存在误读隐藏文本的现象,将服务对象的行为逻辑理解为家庭氛围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文本背后暗含的更为真实细微的原因。对“隐藏的文本”的误解在实践过程中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解读文本的逻辑错误,文本作为群体自主意识的表达,呈现的是服务对象的自主意识,而在实践中总是忽略了这种意识,出现“代替、包办”的逻辑错误,认为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有限、缺乏选择判断能力,认为村民文化知识的落后与思维视野的局限会影响他们的正确决策,所以在服务过程中会出现“替代抉择”的溺爱行为;二是解读文本的立场错误,作为接受过理论熏陶与

实践训练的专业人员,社会工作者对自己掌握的专业理论和方法有着深深的自信,当实践出现与理论相违背之时,这种深深的专业自信总是引导社会工作者将责任推向对方,认为服务对象是实践困境的根源,认为服务对象的不配合是他们自身素质不高、社区氛围较差等原因所致,而忽略了对自身的反思;三是解读文本的方式错误,受到长期的专业训练,一些专业词汇总是很容易脱口而出,在了解他们行为逻辑背后的原因时,社会工作者总会不自觉地运用“分享”“自决”“尊重”等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沟通难度。

(三)缺乏宏观结构的敏感

底层视角强调通过微观个体行为探析宏观结构,这与巴尔廓帕尔提出的“扩展的临床视角”不谋而合,都强调对生态系统等宏观结构的改变。由此可知,要解释服务对象的行为逻辑,就应该把他们置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去考虑。尤其是以关系为人际交往特征的农村社会中的个体,生态系统对个体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橡皮筋绑在一起的支架,强大的关系网络支撑着个人与家庭。对于村民而言,学校场域、工作场域、朋辈群体、家庭场域以及社区系统等,都对村民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实践中对宏观结构的敏感性不足,缺乏对村民所处场域的介入和改变,比如在开展留守儿童服务的过程中,与教师的互动、与政府官员的沟通以及对抚养人的走访较少,导致无法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从而影响了介入效果。除此之外,缺乏宏观结构的敏感还表现在对农村社会实际情况的忽视,忽略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在生活习惯、生产方式、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差异,没有考虑到农村社区的独特性。例如在开展老年人活动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组员不遵守小组规范、表现散漫等情况,就其原因是活动安排不符合农村老人的实际情况,忽略了留守老人的生活作息习惯、性格特征以及需要照看子孙等实情。

通过对实践的反思,本文对农村社会工作做出如下探讨,以期对解决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提出可能的建议:农村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内容,要以底层视角的理念来看待服务对象,注重站在底层的视角来解读“隐藏的文本”背后的行为逻辑。在实践中通过发掘服务对象的亚级次话语来还原其真实需求,注重服务对象所处社区的文化、制度等宏观结构的影响,同时要经常性的反思以促进实践的进步。

[参考文献]

- [1]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2007,《专业限制与文化识育: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文化问题》,《社会学研究》第6期。
- [2]聂玉梅,顾东辉,2012,《增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应用》,《理论探索》第3期。
- [3]王庆明,2011,《底层视角及其知识谱系——印度底层研究的基本进路检讨》,《社会学研究》第1期。
- [4]王思斌,2001,《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第2期。
- [5]杨发祥,闵慧,2011,《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探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 [6]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2008,《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第6期。
- [7]Guha, 1983, “The Prose of Counter- Insurgency. ” In Guha Ranajit(ed.), Subaltern Studies II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编辑/陈敏